

世界著名思想库

——美国兰德公司、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见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张静怡

RAND
ISS
DSUOE SRGNDU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世界著名思想库

——美国兰德公司、伦敦国际
战略研究所等见闻

张 静 怡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世界著名思想库

——美国兰德公司、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见闻

张 静 怡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94千

1985年 6 月第一版 1985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发行

前言

“思想库”这个名词，最早是由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在六十年代中期讲出来的。但是，当时年已八十高龄的这位前总统并没有来得及看到，他的这句即兴之谈不久就被人转用于称呼那些以在社会各个领域从事“创造性研究”为己任的各种研究机构，而且很快就风行欧、美，成为新闻媒介和人们交谈中的一个“时髦”用词。这当然绝不仅是出于西方人崇尚新奇、制造新词的癖好，而是由于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和满足现代国家日益复杂的决策需要的推动之下，思想库这个“年轻工业”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并且成为“现代国家决策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它的发展程度和社会作用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总的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

在我国，随着“四个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党中央关于重视科学、重视知识的号召日益深入人心，社会上各行各业对思想库的兴趣与关注也与日俱增。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从事战略研究的需要，我不断有机会接触一些美、英、日本、西德等发达国家的战略和外交思想库，并前后几次在美国兰德公司、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以及英国牛津大学伊丽莎白女皇学院等著名研究机构作了较长时间

的停留。随着我对这些思想库的工作和成就，尤其是它们在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决策中的作用的具体了解，深感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急需加强，因而逐渐产生了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向国内同行做些介绍的念头。几年来，每次回国都不免应邀去一些兄弟部门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感受，一九八二年以来也陆续写了一些内部报告，并应《瞭望》杂志之约发表了几篇公开文章，未料竟受到各方的热情欢迎与鼓励。但因自己的研究处于草创阶段，百废待兴而能力绵薄，从未敢有写书之想。此次幸赖军事科学院一些同志的热心鼓励和大力支持，我才有勇气做一次尝试。

我之所以说是“尝试”，绝不是故作谦虚或故弄虚玄。因为谈论思想库，实际上涉及的是在现代条件下和国内、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科学的国家决策的大题目，要想对它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论述与分析，绝不是我的能力、知识结构和只在一些外国思想库走马观花或匆忙地下马看花的经验所能够承担的。我想做的仅限于把自己亲身看到的、听到的有关鳞爪和个人零乱的印象、体会，再加上一点“业余爱好者”式的考证，稍加汇总奉献给读者和朋友们，如能引起有志者的兴趣与关注，并为建设我国自己的、能为四化大业献计献策的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魄的“思想库”提供一点参考，则幸甚。

在这本小集子里，一共收录了五篇文章。前三篇取材于以往写的一些内部报告、在军内外单位的讲稿和公开发

表过的有关文章，只是根据近一两年了解到的新情况做了些增删替补；后两篇是为了本书出版而新写的。这样，全书共收入了一篇总论性的文章和四个典型剖析。

我选择美国兰德公司、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英国爱丁堡大学防务研究中心和约翰·埃里克森教授以及《大战略》一书的作者约翰·柯林斯上校在美国国防大学主持战略研究组工作的经验这四个典型，有以下几层想法：其一，规模有大、有中、有小，国别有美国、英国和“跨国公司”（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性质既包括民间、也包括军方直属的思想库；其二，内容上，尽量使读者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库的组织、历史、背景、特点、研究方法以至研究的课题能有一个概括的和轮廓的了解；其三，有宏观研究（如柯林斯上校的怎样鼓励和支持研究人员从事创造性的思维，以求得在大的战略概念上的突破），也有微观研究或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如埃里克森教授如何解开苏军这样极端保密的军队的一些十分具体的情况之“谜”，并进而从中分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动向来）；其四，要写人，写事，也要写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和道理。总之，不敢求全，又力求反映更多的侧面，为的是求其对我们有较广泛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并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当然，篇幅不长而竟想做到覆盖面广，这很可能是我的一种非分之想。

说起“覆盖面”，一些同志曾希望我把这本集子尽量

写得“也带点普遍意义”，我动笔时也曾努力兼及一些其它专业研究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但限于自己的眼界和在海外的接触面，结果仍主要是反映了战略研究方面的问题。好在战略研究是一门高度跨学科、跨国界和高度宏观、高度综合性的学问。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说过，战略，在它的最高一级“接近于治国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不足之处当可从战略学科的固有特点得到某些补偿，效果也许还不至于使朋友们完全失望吧。

本书在体例上不拘一格，唯一的愿望是把自己在这些世界闻名的思想库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感受到的“第一手材料”，如实地放到读者面前，让读者们尽多地获得一些“现场感”，以便从一些真人、真事中，确切些讲，是“活人、活事”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和求得自己的答案，而不是仅仅用一些干巴巴的个人结论去强加于人。后一种做法将不仅是乏味的，也是不科学的。取材中，对于“活材料”尽量加以收录，所缺情况却没有时间去查找别人的材料加以补齐。其结果，“画面”恐怕不会十分谐调，有的部分或可比作“工笔重彩”，有的地方则又只能是“写意”，就象打仗时手中那份“作战地图”是用五万分之一和一百万分之一的两种不同比例尺的地图拼凑起来一样。这也是出于无奈。本书的“自觉症状”还不止这些，只有留待以后去修改补正了。

本书虽然力求真实，但同一事物在不同人的眼里，总

是会由于各人的经验、角度等差异（姑且不说立场、观点和水平）而有不同，因而偏差、错误之处在所难免，除希望读者批评指正而外，本书只作为“内部读物”发表，原因之一也是为了避免谬种流传。这样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书中转引的一些“宏论”或“谬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与外国同行们茶余酒后的私下交谈，每每互相约定“仅供个人参考，不作记录，不得外传”。此次成书虽将有些特别敏感之处或删其语，或隐其名，但为求尽量“保真”和有现场感，仍将大部奉献于读者面前。事关国际信誉和工作利益，为了不引起复杂后果，有关内容，请切勿对外引用，敬希读者谅解与支持。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本集子里介绍的国外一些著名思想库的情况，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现实情况不同，我们不宜与之作机械的类比。但是，引为参考和借鉴，有分析地从中吸取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则是有益的。

这本集子终于能同读者见面，首先应当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出版社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热心支持，还应当感谢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研究所的领导和其他同志们。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包括许多同志默默无闻地分担我的许多日常事务，为我提供各种服务与保障，它是难于问世的。如果这本集子还有存在的价值的话，除了奉献给广大读者外，还应该献给上述这些

同志，以表示我深深的敬意。

张静怡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目 录

前言.....	(1)
从美英一些战略和外交研究机构 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库.....	(1)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剖析.....	(16)
美国著名思想库.....	(48)
——兰德公司半年见闻	
“小的是美丽的”典型之一.....	(106)
——著名苏联军事问题权威、英 国约翰·埃里克森教授及其 “防务研究中心”小记	
约翰·柯林斯上校及其关于战略研究中如 何寻求概念性突破的一些经验.....	(125)

从美英一些战略和外交研究机构 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库

目前不同专业、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思想库几乎遍布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社会领域。论述思想库的文章、专著也已不少。本文只是想就作者近几年来在英、美一些战略、外交思想库从事研究工作和学术交流中的点滴见闻与体验，对这一“年轻工业”试做一番颇为粗略的介绍，以供参考。

一、现代社会的产物

“思想库”、“智囊”，追根溯祖，应当说古已有之，对中国人并不陌生。但古代的中、外“智囊”，诸如帝王将帅的幕僚，更多地是凭借个人的学识才智，及其同所“事”之主的私人关系，在若干决策中发挥或多或少的作用，甚至在有的情况下，还起到过“一言兴邦”的重大历史作用。然而，它与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的、按照专业组织起来的现代思想库相比，无论在规模上、数量上，还是在国家决策或推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上，都

有大的差别。

当西方国家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社会生产、流通的迅速扩大和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既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密，又使各行各业间相互依赖加深，关系更为盘根错节；加之现代交通事业和信息手段的发达，各种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和扩大，一国事务同国外因素的互相影响不断增加，尤有甚者，当世界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在加速发展的现代科技推动之下，当代各种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交互作用的结果，“地球变得更为狭小”，而人类各种活动的节奏却大大加快，危机与难题的发生往往带有很大的突然性，而新的机会与希望也同时大量涌现，情况瞬息万变。所有这些因素使现代国家的管理、指导和决策变得空前复杂。面对成堆的、需要迅速决策的复杂问题，西方决策人本应更多地研究和思考，而做起来却如一些美国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当他们忙于应付和作出大量日常决策的时候，也就没有时间思考了。”几十年来政府机构尽管不断扩大，单凭政府官员仍难完全把握急剧变化的情况和多种门类的专业知识，进行决策，而需要动员和依靠整个社会的“智力资源”的经常支持了。政治家们转而向学术界寻求帮助和“额外营养”，于是，思想库就应运而生了。

现代思想库的兴起，在美国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早的如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成立于一九一九年，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建于一九二七年，等等。但冠之以“智囊”，则是后来的事。据美国权威方面考证，“智囊”（Brain Trust）一词始见于一九一一年，其大量用来称呼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民间学者集团，则在一九三二年。当时报界首先用以称呼弗兰克林·罗斯福从哥伦比亚大学聘来为其竞选总统出谋划策的几位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思想库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纳粹在欧洲崛起后，一部分有远见的美国人感到如不进行一些宣传工作，将无法使美国人摆脱孤立主义以对付大战的威胁，于是一批新的研究机构产生了，例如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就是以教育公众、引起他们对国际问题的兴趣为宗旨，同时也提供有关外交政策的建议。

思想库的真正大发展，首先出现在战后的美国。“喷气机时代”的国家决策本来就远较战前复杂；而超级大国的地位又使它介入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角落的事务；加上战时和战后有大量科学家从欧洲移居美国，为思想库的发展提供了客观需要和雄厚的基础。自此，各种专业的和综合的研究机构如同雨后春笋，大量出生于著名高等学府的校园和各大政治、经济中心。

在西欧、日本，随着战后的重建和发展，出于同样的社会需要，思想库稍后也蓬勃发展起来。等到人们改用“思想库”（Think Tank）（语出美国前总统哈里·杜

鲁门在他一九六四年八十岁生日的讲话)取代“智囊”来称呼这些机构时,这一“新兴事业”在美国已被称为“二十亿美元的工业”,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已经“无所不在”了。

二、背景各有不同,形式“百花齐放”

这些为数众多的机构都各有不同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其中多数是因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例如:二十年代美国有人痛感当政的官僚“在知识上不足以应付业已在工业、经济和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美国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于是用圣路易城大资本家罗伯特·布鲁金斯的遗产建立了布鲁金斯学会,最初目的是研究出一种衡量政府活动是否适宜的“尺度”,以促进建立“更有效的政府机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则是五十年代末期英国学术、宗教、新闻等界感到苏伊士战争中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未能在引起公众对防务问题的重视上发挥作用”而建立起来,以后才逐步发展为国际性机构的。

还有一类则有党派色彩。以美国为例,布鲁金斯学会原是共和党人所建,后来也赢得民主党人的尊敬,却遭到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的不满。一九四三年,这些人就另成

立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十年前又有些共和党人觉得它也“退化”了，于是又另立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人大会 (American Assembly) 是由艾森豪威尔一九五〇年倡导建立的，其宗旨则与上相反。他担心战后美国出现对外政策上的分歧而引起分裂，因而该会吸收两党人士参加，谋求“在美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向政府和国会提出两党一致的建议。”

另有一类思想库，如美国的赫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等，则被认为是“战时经验总结的产物”，其中尤以兰德公司 (The Rand Corporation) 最为典型。二次大战中，美国政府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而集合起一批科学家从事对许多问题主要是军事、特别是与空军作战有关问题的研究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战争结束，军队里没有这些人的合适位置，而军事部门又缺乏他们具备的那种“能够处理同高级技术或专门才学有关的军事问题的能力”，于是，由阿诺德元帅发起，得到福特基金会等的支持，建立兰德公司，通过签订合同的办法，使这些人能够继续为军方和其它政府部门作出贡献。

从数量上看，也许更多的研究机构是设在大学里，象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伯克利、密执安等大学众多的研究机构，英国的牛津、剑桥、爱丁堡、阿巴丁大学的各种研究中心，久已在国际上享有盛

名。

此外，还有两类研究部门与上述有所不同。一是官方机构所属，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研究部，国防大学和三军高等院校的教研室和研究部，英国桑赫斯特军校的研究中心等，虽属官方，直接为议员、政府、军队服务，但却又力求保持独立见解，同样在发挥思想库的作用。二是有些大企业或企业集团的研究机构，专业造诣也是很深的，但由于它们的主要宗旨是为了企业的利益向国会和政府“游说”，人们对之往往是另眼看待。

这些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形成了不同思想库的不同特长、不同风格和发挥影响的不同渠道。

这些机构的组织形式就更为多样。除了各个国家的以外，还有“跨国的”，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各国的“姊妹机构”，如北约组织每个成员国都有一个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规模大的如兰德公司，人员上千，在景色如画的洛杉矶海滨占地几个街区；小的如著名的苏联军事问题权威约翰·埃里克森教授的爱丁堡大学防务研究中心，仅有一位秘书和四间“斗室”。当然，最小的还要算“单干户”——“独立研究者”。论经费，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每年四、五千万美元；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不过年有六十万英镑。

从研究领域看，布鲁金斯学会等遍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兰德公司则广到从受托研究空间战略、加里福

尼亚州供水政策，直到荷兰的水质问题；窄的则每年专注于一、两个题目。

研究力量的组织和使用就更灵活多样。兰德公司等以自己的专职人员为主，美国人大会则完全通过订合同委托别人进行，企业研究所、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则两者结合。另外，也时常有几个机构或官民合组工作班子，联合进行专题研究。总之，形式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各有千秋，难以枚举。

三、作用日增，成就相当可观

概括起来，现代思想库的职能大致有三：

（一）提供政策建议与各种咨询服务。

这些思想库终年无孔不入地搜集情况，查考档案，冥思苦想地进行分析，归根结蒂是为向决策当局提出政策建议，而不仅仅停止在情况分析上。这是它们的一大特点。正如兰德公司主席唐纳德·赖斯所说，要让政府“了解事态发展的真实含义，提出几种政策选择，分析实行起来会有什么影响”，以便于政府作出及时、正确的决定。此外，一项经常的“业务”是应政府或议会之请参加各种重要决策前的“听证会”、“背景分析会”，等等。一九八三年舒尔茨国务卿访华前就曾邀请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温斯顿·洛德、兰德公司政治学部主任里查德·所罗门等学者